

（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出版）

本期目录

【难忘岁月】	铁流、洪流与盲流——我的1966年大串联纪事	葛兆光
【书刊评论】	《清华七二七事件》序	川文
【文献资料】	蒋帮头目和文人尊儒反法攻击批林批孔言论摘编	

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《文革博物馆》“最新展出厅”及各有关“展厅”，欢迎前往浏览，网址为：<http://museums.cnd.org/CR>。

【难忘岁月】

铁流、洪流与盲流——我的1966年大串联纪事

• 葛兆光 •

“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。大串连，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，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。大串连，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，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。大串连，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。”——《人民日报》1966年11月27日的报道

第一部：铁流

◇ 戴上袖章冒充“红卫兵”

当停留在贵阳南站已经一天多的火车，吭吭哧哧艰难地开动的时候，一直窝在座位下面的我高兴极了，把早就准备好的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的袖章往左胳膊上一套。说来也奇怪，戴上这个袖章，就仿佛日月换了新天，打灵魂里把前几个月的霉气一扫而光，虽然这袖章是自个儿捡了红布缝的，那八个字也是自己悄悄用黄漆写上去的，但不知咋的，戴上它好像就浑身往外蹦豪气，连胸脯也挺得起来，更别提说话了，带了袖章算“革命小将”，说话就是比没戴袖章的“黑五类子女”嗓门大。

就在两个月前，我还在贵州凯里城外三十里的挂丁还往南的苗寨山上，每天抡锄头开荒。被送到这里开荒，是因为我所就读的凯里一中，从六、七月间已经开始文化革命了，红色队伍觉得这些“黑五类子女”很碍事儿，批斗一阵后兴味索然，就干脆集体打包，送到学校农场了事。后来想想，觉得这方法就像古人区隔华夷之法，索性把红与黑分开，叫“壤断土隔，不相侵涉”。在一个月的开荒日子里，山上几乎能吃的野果子和地里漏网的红苕根儿，都被我们这几十个“黑色”学生吃完了，因为太饿，顿顿四两米饭带五分钱白水煮南瓜块儿沾辣椒，顶不住十五六岁的学生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。人饿的时候，常常两只眼睛发绿光。更难受的是，每天要面对红卫兵们的鄙夷眼光，心里好像长着毛，实在觉得憋屈。真没有想到，就是两个月时间，居然没有了人看管，也就自行回到了县城，人一获自由，连骨头

都轻得发痒。唯一羡慕嫉妒恨的，就是可以戴上红袖章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，于是照猫画虎，悄悄缝制了一个，时时戴上自我欣赏一下。

很巧的是，我的几个朋友，家里不是从广东来的，就是从上海来的，都想出去看看已经差不多忘掉的大城市。刚刚从乡下释放回来的父母，好像也很怂恿我们出行。于是，揣着父亲塞给的五十块钱巨款，悄悄从凯里搭了便车，溜到了贵阳，七转八转，乘黑夜上了据说会开往北京的火车。只是没有想到，这列火车居然从南站开到西站，从西站开回北站，然后又转回南站，就是没有走出贵阳。直到11月10号下午才算真正出发，这时离我们上车已经一天两夜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才仿佛“鲤鱼脱却金钩去，摇头摆尾不再回”，终于放大胆子，戴上了红卫兵袖章。

后来想想，能戴上袖章，一是因为离开自己所在的凯里，外面没有谁认识谁，脸上反正也没刻了“黑五类”的字样，衣服上也没有“反动”的标志。二是已经是11月了，从6月开始热起来的文化革命早就蔓延过了界，革命的和革命的打起来了，打得更激烈，倒把“反革命的”从夹缝里漏了出去。三是因为革命烽火主要是要烧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我们这些落单的、小小的黑五类子女，谁也瞧不上也顾不上。很多年以后，我常想起这一场被冠以“革命”字样的大串联，觉得真是一出闹剧，几百万号称怀揣革命理想和斗争激情的年轻人，被某个伟大领袖口中发出的口号鼓动起来，在无政府状态下到处游荡加扫荡，当然是荒唐。可既有趣又可悲的是，对我来说，离开了熟悉却又屈辱的环境，在没有人知悉根底的地方，却好像真的“脱胎换骨”卷进了革命洪流，从被洪流所吞噬，到进入洪流成弄潮儿，成了鲲鹏，也应了毛老人家那句话，叫做“会当击水三千里”。

◇ 铁流向北京

那一趟火车真是诡异。从贵阳开出，缓缓南行至广西境内，已经天色全黑。看看车厢里，车上到底有多少人？大概谁也说不清，一个原来三人坐的位子挤了八个人，四个在座位上，一个钻在椅子下，两个横在椅背上，还有一个挂在行李架上。几乎没有过道，因为已经像沙丁鱼似的挤满了人，也等于没有厕所，小小的厕所里已经塞了三个人。虽然已经是十一月，车厢里却热得像蒸笼了。至于水，只有在每次停靠站的时候，从站上热心的人那里接一点儿来解渴。我们这节车厢有几个自称来自北京钢铁学院的大学生，自告奋勇地充当“头儿”，一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，还充满激情地说，“看呀！前面就是北京了，毛主席在那里等着我们”。不过，谁都知道北京还远着呢，这种激励就像曹阿瞞的“望梅止渴”一样，在没有水喝的时候让大家暂时安心。

没有水喝，也没有饭吃。已经熬了一天的满车红卫兵（我这时也是红卫兵了），毕竟也一样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”。这时，火车缓缓停在广西一个叫“六甲”的地方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黔桂铁路经过的广西河池地区的一个小站。记忆中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天这么黑的夜色，从车窗中钻出去，除了站台昏黄的灯光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人仿佛一头钻进迎面罩过来的巨大黑布袋子，我努力睁大眼睛，好半天才朦朦胧胧分辨出，面前有一个巨大黑影似乎压过来，先以为是近处长了一棵高高的大树。可是，哪里有如此巨大的大树？再定睛看，上面影影绰绰地还有幽幽的灯光，过了好一阵，才惊讶地发现，这原来是远处一座高可入云的大山，是广西那种直上直下的兀峰。这个视觉上的奇怪经验，很多年以后再也不曾遇见，也一直留在心底。

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，在车站上乱转了一阵之后，大家拮据决定由钢铁学院的两个大学生率领我、另外一个膀大腰圆的贵阳中学生，拿了两只手电筒到车站外寻找吃的东西。所谓车站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票房加候车室，绕过这个简陋的车站，走不了多远，就到了镇

上，镇上黑麻麻一片，谧静得像死城，更诡异的是，连狗都不叫，但石板街口却有一个透出火塘光的店铺，好像热腾腾地还冒着蒸汽。

◇ 老红军传统，还是草寇剪径？

有蒸汽就一定有吃的，我们决定闯进去。卸开一块门板，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口大蒸锅，锅上居然有一个硕大的甑子，甑子里面更让人喜出望外的，居然是有一两百只枕头形的热粽子。饿极了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顾一切，撕开热气腾腾的粽叶，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了几口。毕竟是大学生的，那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建议，“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，也要像长征的红军一样，给老乡留下借条，等革命成功以后加倍赔偿他们”。于是，借了手电的微光，匆匆写了一张借条，记忆中的内容大概如下：

亲爱的老乡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，今天路过这里，去伟大首都北京，特向您借粽子若干，留下人民币两元，以及借条一张，作为今后偿还的凭证。
此致敬礼

落款是什么，现在已经记不得了，总之是“红卫兵”之类罢。只记得那个大学生字写得歪歪扭扭，还有“粽”字不会写，让我心生诧异。不过，这种说不清是“老红军”的革命传统，还是“草寇剪径”的磊落方式，当时还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于是呼啸一声，四个人分头扛了棕绳穿好的粽子，飞也似的回到火车，迎来了满车厢男男女女的齐声欢呼，感觉上，似乎比喊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口号声还要响亮。

◇ 居然到了北京

革命的岁月一切都随意，连火车也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。从六甲开出后南经柳州，掉头往北，经株洲、岳阳、武昌，终于过了长江。

车上的日子已经过了四天四夜，不要说没有蔬菜水果，就连喝的水也是时有时无，更不要说洗脸。停车的时候不敢开窗，因为窗户一开，就会有红卫兵们像疯子一样往上爬。有一次，车里的人狠狠地把车下往上扒的人推下去，结果遭到车下一桶滚开的开水泼进来，好在天冷，算是没有人烫伤。车厢里面，早已满是汗、屁、尿混合的熏人气味，蒸腾而浑浊的空气几乎能让人窒息。加上吭哧吭哧的火车，把人摇晃得七倒八歪，现在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像“雄赳赳，气昂昂”跨过长江实现理想的先锋队，倒像是一群被堆垛在铁皮箱子里东倒西歪的流浪汉。那几个一开始争着要当领袖的北钢大学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下了车。几个从贵阳来的中学女生，干脆集体占了厕所，对每一个要进去小便的人横眉冷眼，意思好像就是你休想鸠占鹊巢。高高的行李架上，已经躺上去一排人，挂在上面睡觉。而座位底下的红卫兵们，已不再需要斯文地铺报纸，脱了外衣就钻进去呼呼大睡。有幸坐在座位上的沙丁鱼们则交叉地枕了大腿或胳膊，扭着身体休息。早先那些“火车向着北京跑”、“我们想念毛主席”之类提神醒脑的口号，也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，车上的各色人们，话越来越少，只剩下鼾声夹杂着咳嗽声。从第五天起，我已经开始牙龈出血，两腿肿胀，加上感冒，昏昏沉沉中，被好心的同行者推上了行李架，躺了一天一夜。

第六天上，没有任何先兆，咣当一声，火车居然停在了北京。

第二部：洪流

◇ 清华体育馆中“民族排”

昏昏沉沉的我，和那两个一起出来的同学，在先农坛体育场排了队，三弯两转地被大客车拉到清华大学，住在体育馆里。很久以后，我居然成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老师，回想起来，常常觉得我和清华似乎有缘。这当然是后话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体育馆曾是当年马约翰上课的地方，在抗战的时候，也曾做过日本鬼子的马厩。1990年代我当了清华教师之后，学校里渐渐添了好多高级的篮球馆、游泳馆，那个老体育馆就显出破旧。不过，在1966年的冬天，它给我们这些刚刚到伟大首都的学生特别温暖的感觉。里面有浴室，记不得是否进去洗过澡，也有暖气，让南方来的人感到燥热，让北方来的人觉得舒服。体育馆里铺了木条板的篮球场，成了我们睡觉的地方，体操课用的垫子，则成了身下厚厚的褥子。隔着跳球中线不过一米宽的过道，男红卫兵一半，女红卫兵一半，虽然并无屏障，一览无余，却也井水不犯河水。革命时代的性别意识，毕竟被煅烧锤炼得很纯净。

身上一热就觉得发痒。我们从贵州来的三个学生，因为“贵州”的缘故，糊里糊涂被算成了“苗族”，和一些新疆来的维族、内蒙来的蒙古族和广西来的壮族学生一道，被编为“少数民族排”。其实，我的两个同伴都是出生在广东和上海的汉族人，一个姓谢，一个姓张，但是，想到“少数民族”这个名义能够沾好多好处，我们也就默不作声，暂时改换了民族。刚刚安定下来，旁边那三个异族学生，就翻开他们充满羊肉气味的皮毛衣服，有滋有味地找起衣缝中的虱子来，一边找一边掐，听着叭叭的声音，自己也觉得痒了起来，翻开衣服仔细看，原来早就招了同样的动物，于是加入脱衣捉虱的队伍。

后来听说，大串联是虱子传播最快也是最广的时代，不知道这在动物学史上有什么意义。

◇ 在北京的冬日里意兴阑珊

四海翻腾云水怒。那个时候清华、北大的“文革”正在如火如荼。可我们这些来串联的中学生却并不很热心革命，虽然偶尔也去看大字报，更多的时间却是在游山玩水。1957年到1960年，我曾经在北京上过三年小学，寻访记忆中礼士胡同的老家、演乐胡同的少年之家、景山公园里的少年宫，北海和颐和园，成了我最重要的活动。头三天里，我每天都坐公共汽车到新街口，排上半小时队，转到城里去闲逛，每天晚上却都带着失望回到清华体育馆。因为那些记忆中的旧居、幼年时的乐园、充满欢乐的公园，在肃杀的冬天和紧张的气氛中，似乎都褪去彩色变成黑白，连礼士胡同原来飘着的烤红薯味儿，也已经不复存在，只有胡同东口靠南小街的大槐树梢上挂着的冬日，仍然留有鹅蛋似的红色。

这让我很伤心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才悟出这个道理，小时候一切记忆中的美好，千万不要重访，最好是让记忆永远是记忆，因为重访的结果往往是失望。三天后，我不再去寻找过去的记忆，整天去北大和清华闲逛，看着那些激情满怀或者仇恨满腔的大字报在瑟瑟寒风中飘零，看着那些曾经辉煌和显赫的名字，被颠倒书写加上红叉，心里觉得实在困惑。那个时候的红卫兵好像也有些懈怠，斗过了最大的走资派和他的老婆，没有更刺激的事情可做，清华的大字报在我们入住的那些天，似乎也少了起来，这让“取经人”颇为失望。好在清华每天食堂免费供应的肉末白菜加大馒头，比起贵州老家的伙食好得多，经历过苗寨里饥肠辘辘，现在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“肉末”，真有点儿让人“乐不思蜀”。

何况还有等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，这毕竟是一件让人期待和激动的事儿。

◇ 万众期待的浩大盛典

很多年以后，我才想通，原来这种浩大盛典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，可能就是大型娱乐节目。就和古代上元节京城开放宵禁观灯一样，《礼记》里面记载，古代腊祭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，子贡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问孔子说，“一国之人皆若狂，赐未知其乐也”。孔子好像也没明白这个道理，只是回答子贡说，这是让民众“一张一弛”。但他不知道，这种盛大的欢会和典礼，对于在上者来说，乃是宣示政治力量和真理信仰不可或缺的形式，就像古代的泰山封禅、南郊祭天。

见毛主席那一天，是11月26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早上四点不到，就被负责我们的解放军叫醒，先是检查身上有没有异常物品，除了钢笔之外，不可以有其他任何坚硬的器物，然后是分发一天的食物，包括两个大馒头、两个白鸡蛋和一个大苹果。随后，解放军带着我们浩浩荡荡在夜色中，如洪流般迎着寒风从清华大学向西郊机场进发，因为是见毛主席，所以每个人似乎都心情激荡，揣着激动也不说话，默默地向前走。唐诗里说“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”，我们这些“红卫兵”既无弓箭，也无车马，倒也在寒风猎猎中举着旗帜，让人想到岑参的“纷纷暮雪下辕门，风掣红旗冻不翻”，在黎明前漆黑的夜色中，默默前进，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。

在零度以下的北京清晨，我们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。到达西郊机场的时候，回看东方天边，已经微微发白。机场上除了预留给主席车队的跑道之外，都是枯草漫地的黄土地，我们就在黄土地上列队，十万大军，彩旗飘飘，场面很是壮观。因为是“民族排”，我们这一群学生被安置在方阵的前面，准备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。

第三部：盲流

◇ 狂热与激情之后

毛主席接见的过程，虽说是高潮，可这高潮真不想一一细说。第一，虽然从早上六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十二分，毛主席的车队才过来，那时已经人困马乏，饥肠辘辘，但在车队来的时候，还是引起一阵激动和欢呼。第二，要命的是，这激动和欢呼帮了倒忙，由于西郊机场除了跑道之外，以黄土漫地，太多的人一跳一闹，便引起黄土飞扬。大概是害怕伟大领袖遇到危险，车队当即加速飞驰而去，我们沾了民族排的光，还算看清了第一车上的毛主席（至于后面车上是什么人，根本不知道），可排在后面的红卫兵们，也许连第一车上的人影也没有看清。第三，还是激动，毕竟苦等十来小时，就为看这么一眼。事后想，被看的称得上“神圣”，看的也称得上“虔诚”，神圣与虔诚总是相生相伴。我记得，路过邮局便给家里发电报，邮局营业员头也不抬，因为当时挤在邮局里，争先恐后发回家的电报，肯定千篇一律地是“4点12分见到毛主席”。

盛大的典礼在历史上常有，它给参与者带来的是欢乐和激动，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。一个法国学者研究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的国家祭祀后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因为人们过厌了持久而平淡的日常生活，产生了欲望不满足与精神被压抑的倾向，于是，便需要有这种典礼激起的瞬间高潮。而政治领袖同样也需要有这种神圣化的瞬间，一方面把自己的神圣烘托出来渲染开去，一方面借助这一火种把深藏在民众之中的破坏性力量，引导到敌人身上。说实话，我至今想不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要从八月十八日起，在三个月中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冒着经济停顿的危险发动全世界规模最大的“大串联”。但我在西郊机场看到那种狂热与激情，就好像狂欢节中的巴西人和西班牙人一样，这种力量确实让人不寒而栗。

可是狂欢之后呢？

◇ 我的父母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“横扫牛鬼蛇神”

俗话说“树倒猢猻散”，可是在西郊机场见过毛主席之后的十万红卫兵呢？大树不倒，猢猻却刹那间溃不成军。北京冬天黑得早，四点半之后天色渐渐昏暗下来，早没有了队列的人东一拨西一拨，倒扛着旗帜仿佛刚刚从战场上溃败下来，游兵散勇从西郊机场到海淀清华北大一带的路上，稀稀拉拉就像羊拉屎豆儿一样，拖了一路。满眼看去，路上都是东倒西歪、疲惫不堪的人群。

洪流之后是盲流。狂热和激情之后，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，奇怪的是，就连管我们的军人也突然不见了。虽然食堂里还有肉末熬白菜可吃，虽然清华体育馆里照样热气蒸腾，但人却像没头苍蝇一样，用现在的话说是“找不到北”，而用当时的话说，却是“找不到革命大方向”。我们一群人，每天在北大、清华、地质学院这半径一里的地方摇荡来晃荡去。大概是毛接见以后的三天罢，我在清华、北大之间闲逛的时候，看见一辆三轮板车，拉车的是一个身穿蓝色列宁装，脖子上挂着沉重木牌，上书“美国间谍臭老婆”（下面的名字记不得了），年约四五十岁的女性，车上颤颤巍巍地半躺半坐的，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年男性，白发中渗出绛黑色的血迹，脖子上的木牌看不清，大概就是那个所谓的“美国间谍”吧。一群和我一样斜挎草绿书包、戴着红色袖章，不过是中学生年纪的青年，挥舞着皮带，狂喊着口号，簇拥着三轮车呼啸而去。不知为什么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心头一阵惊悸，仿佛从梦中醒来，想起我的父母。

虽然我在外面换了身份，也叫做“红卫兵”，不仅白吃白喝四处闲逛，也像个真理化身似的“横扫牛鬼蛇神”，可我的父母却仍在贵州苗乡那个县城里，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“横扫牛鬼蛇神”。父亲被隔离起来，陪着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挨斗，罪名只是由于他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在台湾。母亲则被斗争之后，驱赶到三十里外挂丁河边去筛沙，而她曾经背负的罪名之一，恰恰便是莫须有的“间谍”。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说实在话，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什么清楚的反省意识，也不曾检讨过这场革命的荒诞意味，更不敢怀疑文化圣战的正确性，但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却微微一颤，我知道我应当回家了。

需要补充一句的是，三十年以后，我的家居然就在那个让我心悸的地方，名字叫作“蓝旗营”。

◇ 我该回家了

老话说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那个时候的新说法是，条条道路通北京。可来得容易去却难，当你往北京赶的时候好办，从北京出去却是乱糟糟的，几十万红卫兵就像溃堤之水，汹涌地向四处横溢。不甘心只到北京的，仍然借了免费火车和免费饮食到处乱走，我们那个民族排的壮族红卫兵打算去新疆，新疆那几个维族红卫兵却打算南下广州，我的那两位同行者，一位打算回老家上海，一位则希望回故乡梅县，我则铁了心要回家。

说不尽一路的风霜雨雪。还是那塞满了年轻盲流的火车，还是那混合了汗酸尿腥的浑浊气味，还是那有一顿没一顿的饭菜。可是，再也没有激昂的口号，也没有嘹亮的歌声，更没有理想的大话。从北京到贵阳的两天三夜里，车上吵架与打架交织，鼾声与哭声齐飞，留给我的记忆就是“乱”。记得出发时曾反复念叨毛主席的那段话，“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，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”，这大概那只是事后幸存者提神的想象

和提升的意义，真的在路上含辛茹苦的时候，谁也不知道归宿是何处，为何长征大串联。
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那种豪情，在思乡望归的时候，便只剩下了“关山度若飞”的期盼。

1966年12月5日。我还记得那天贵阳阴沉沉的，刮着北风，感觉很冷。在省交际处附近的一个专门收容串联红卫兵的学校里，刚刚回到贵州的红卫兵们，把身上的衣服脱光，丢进一口沸水大锅里去杀虱子。瑟瑟风啸中光着身子躲在被子里，几十个人在那里闲聊，说起一路上的感想，一路上的观感，好像没有人说起“文化革命”，没有人说起“见到毛主席”，也没有人说起“打到走资派”，说得最多的一个词，就是“回家”。

可是，家能回吗？父亲还在被隔离吗？母亲能够从乡下回来吗？他们平安吗？妹妹和弟弟在家吗？回去以后还会被红卫兵看押吗？我手心里攥着那一个子儿也没有动过的十张伍元钞票，反复想象明天回家后的故事。可是，我怎么也想象不出，等候我的将是什么情景，心在一点一点地沉下去，沉入一片黑色的迷茫之中。

□ 原载：《南方周末》2011年2月24日

~~~~~

#### 【书刊评论】

#### 《清华七二七事件》序

· 川 文 ·

一

庸常的日子大抵雷同、容易淡忘，革命的岁月风起云涌、记忆难以磨灭。在清华文革“老五届”的脑海里，1968年7月27日永难忘怀。

是日晨，数万之众的军民队伍、以“首都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的名义，开进清华制止两派武斗，遭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武装抵抗，发生5死731伤的重大血案，史称“7·27事件”。

历数文革大事件，论冲突规模、伤亡严重，“7·27事件”与重庆、广西武斗相比，无异于小巫见大巫；比轰轰烈烈、影响广泛，也无法与上海一月夺权相提并论；7·27既没有武汉“720事件”那样惊心动魄；更比不上“913事件”那样神秘莫测、震惊中外；“7·27事件”在文革史上的重要意义，却足以与上述事件比肩。但迄今为止的文革回忆和研究中，727事件普遍被忽视，除唐少杰先生的《一叶知秋》、以及若干亲历者的片断回忆外，以727为主题的文革史著述，至今总体尚付阙如，诚为文革史、特别是清华文革史研究之缺憾。

近闻胡鹏池、但燊的新作《清华727事件——1968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华727》）即将付梓，即翘首以盼、欲一睹为快。

窃以为该书题材选择眼光独到、出书时间恰到好处、担纲作者他人亦难匹俦，为文革史研究补充了重要一页。欣喜之余，忽得作者书札，嘱我为该书作序。笔者始则惶恐，中华乃序之大国，传统观念中大抵德高望重、名彦硕儒，方有作序的资格。而时下风气，则多求名人高官代为序跋，迹近为新书开光。不才一介工匠、向与文坛无缘，何德何能敢斗胆为此书作序？然另请高明的建议未得俯允，或者这一次优选择，亦出于作者的无奈。既然无序不成

书，甚至有人断言“书之不堪以无序为最”，总得有人勉为其难。与其请对727不甚了了的名家，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，甚至脱离本书宗旨信口开河，倒不如约727的亲历者，秉“释其名而章其义”序之宗旨，作一点背景介绍，写几句读后感言，至少真实可信。而且在立场上，也符合余英时先生《原序》中所主张的“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”。于是不揣浅陋、斗胆捉笔，不敢以“阐弘大道”为宗旨，但求“推演事义”，为作者开门揖客而已。固难匹作者之雅望，亦或不至于令此煌煌大作，落得“卿本佳人，奈何有序？”的嗤笑。

尽管近年文革题材似为禁区，但海内外的文革著述仍薪火未绝。在文革记事的作品中，《清华727》的选题，可谓独具慧眼。文革大事，要么如八届十一中全会、丙辰怀仁堂之变，基本大白天下，没有更多的文章可做。要么如林彪9·13事件，秘档不宣死无对证，传言推测形形色色、真相始终雾锁深山，文章没法做。而727事件始末，虽内幕若明若暗，倘用心发掘仔细钩沉，却大抵玄机可辨。也就是说既有文章可做，文章也做得下去。

说该书选题眼光独到，更在于727事件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。它既是文革行至中场、当局调整战略，运动发生重大转折的里程碑，也是一场内容丰富、情节曲折、阵容豪华的文革大戏，蕴藏着文革研究的宝贵资源。以727为界，十年文革可划为上下两个半场，上半场的战略是“破旧”，鼓动造反、天下大乱，主题词是“放”和“乱”；下半场则是“立新”，平息动乱、恢复秩序，致力于“收”和“治”。契合文革发动者总结的“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”。清华727，则是继“七·三”、“七·二四”布告等重拳之后，在皇城之下、文革造反重镇之一的清华，由最高当局亲自策划的治乱战役，是文革上下两个半场战略转折的显著标志。

727也是文革斗争方向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。文革前期的主攻方向，无疑是各级“走资派”。经历了1967年的大风大浪、特别是7·20事件，遭遇军方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强烈抵抗后，毛终于不得不囚王关戚以谢天下；不得不放弃文革初大民主、“巴黎公社”等乌托邦的幻想；不得不接受官僚阶层难以根本撼动、仍是其无可替代的统治基础的现实，回到“朕与卿等共治天下”的轨道。在刘邓已被打倒、官僚阶层也受到不小的冲击洗牌后，不再把“走资派”作为斗争主攻方向，以免乱局难收、动摇统治之本。调整斗争方向的令旗，就是文革乃“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”这一最高指示，于是历次运动被迫害的“黑七类”再次遭殃，成为转移斗争方向的牺牲。此后清理阶级队伍、清“516”、一打三反，一波又一波对草根贱民的迫害，得到文革中各级当权派的坚决拥护和变本加厉的执行，其持续时间、迫害范围和残酷程度，远甚于此前对“走资派”的斗争。

727还标志着文革组织领导方式的根本转折。此前传统的各级党团和官方组织被踢开，最高当局以军队为后盾，通过“两报一刊”和广播电台，直接面向全国动员指挥。对各地各系统问题的处置，则是通过一场接一场的中央领导接见，听汇报发指令。即使是1967年各地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实现了所谓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，其功能也只限于维持经济和行政事务，基本不具备领导文革的政治权力，北京市革委会对清华、北大的武斗无可奈何，即为明证。自727始，情况发生了改变，进入清华的宣传队以北京市革委会、卫戍区的名义派出和指挥，宣传队其实就是历次运动的工作组，至多后来有武装军人压阵，可以算是武装工作队。除7·28凌晨在非常情况下临时接见外，中央领导事先既未接见，事后更如蒯大富所悲叹再也见不着面。自此对运动的领导和指令，转而主要通过内部文件逐级下达、而非报纸电台直接昭示全国，中央首长接见群众组织基本停止，随着各级党组织的逐渐恢复和军队全面介入，对运动的组织领导，基本回归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、非与百姓治天下”的传统治理科层体制，因军队的介入近乎四九年进城初期的党军体制。文革领导方式的这一根本转变，727可视为其分水岭。



最后，7 2 7 标志着喧嚣一时的红卫兵运动，终于落下大幕。以蒯大富为代表，“造反派”及头头们的作用、地位和命运，从此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。除上海等地因有张、姚、王等文革新贵的特例外，俗称“造反派”的多数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，遭到整肃清洗。充当过文革急先锋的“造反派”，不但为“走资派”所不容，而且越来越不听招呼，胡乱“炮打”、分裂内斗、偏离大方向不断制造麻烦，树敌颇多，令人侧目。尤其是各地造反派私下串联、可能成为卧榻之侧新的异己力量，而且有被黑手操纵的嫌疑，触犯了天条，引起当局的高度警觉和戒备。“北航黑会”受到的格外关注和敌视，可见一斑。自7 2 8 接见之后，头头们被关进自我认罪、相互揭发的“学习班”，从逐步边缘化到被整肃、直至沦为阶下囚。造反派的失宠，固然是兔死狗烹的老戏码、不作不死的新贵故事，而7 2 7 前后的事态发展，更清晰地展示了这一颠覆性改变的来龙去脉。7 2 7 后，以“六厂二校”为样板，工农兵“占领上层建筑”为旗号，开始对大学实行军管、推进迫害教师、摧毁教育的“斗批改”和“教育革命”。而在红卫兵发源地的中学，昔日的红卫兵被动员发配下乡，红卫兵运动自此谢幕成为历史。

7 2 7 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，还可以从毛对此次行动的格外重视，得到印证。毛一反不过问文革具体事务的常态，亲自对7 2 7 策划部署，在文革中可谓绝无仅有；文革虽用兵频仍，但7 2 7 出动了以警卫军8 3 4 1 部队为核心的3 0 0 多名官兵，也是只此一例；“中央首长”文革接见虽数不胜数，但除广场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外，毛、林、周及所有文革要员悉数到场、小范围接见群众组织头头的，更是7 2 8 仅有的一次。如果说文革初期毛关注清华、重视蒯大富，是因为在打倒刘少奇的关键时刻，蒯是颇具杀伤力、也最顺手的一块石头，那么到了1 9 6 8 年，蒯已势成鸡肋，毛为何还对清华文革如此重视？其实他所重视的，不是清华的7 2 7，而是7 2 7 的清华，是从7 2 7 入手实现文革的战略转折。

由7 2 7 引发的7 2 8 凌晨接见，俨然文革各路神仙的一场精彩演出。舞台上文革要员们态度的同中有异、情感的难得流露、关系的微妙幽暗、话语的多彩风格，令看客们对这出戏的舞台背景和演员关系、乃至对整场文革大戏，会有更生动深入的理解。7 2 8 宝贵的谈话记录，太值得仔细品味、联想和思考，是品位极高的文革史研究富矿。自此再往后延伸，“7 2 7 事件”还是“梁效”登台、批邓导火线等文革后期热点的渊源所在。说7 2 7 对文革研究有重大意义、称本书选题独具慧眼，应该不是作者的夸张。

如此重要题材的著述，成书于当下，时机也颇为恰当。史学界似有事件发生三十年之后，方可进入研究视野的约定俗成。写得太早，缺乏历史距离感，视野既不免逼仄、观点亦易为情感所局限。尤其是作者的见识，尚未经阅历陶冶、岁月沉淀，笔端所至，或缺少陈寅恪先生主张的“同情之理解”。但倘若至今再不成文，随着一代亲历者日渐凋零，无论是对事件的回忆、史料的搜集，还是对知情者的访谈、当事人的求证、以及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，都将大打折扣。即使有后来者今后对7 2 7 再有所撰述，但要做到本书那样内容具体翔实、背景把握准确、读之有现场感，几无可能。而且此书在当下而不是十年前付梓，还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。如今许多亲历者不愿重提文革伤心经历、对本书作者的旧事重提不理解、不赞成、不配合，但曾几何时，文革幽灵却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通过对文革的揭露和反思，让年轻人认清文革的本来面目，两位作者推出此书，可谓正当其时。

## 二

一本书的成败，比题材选取恰当、写作时间合适更为重要的，当然是作者的胜任。笔者以为胡、但两位完成此书最堪胜任，并非溢美之辞。孟子云：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秉亚圣之训，谨对作者其人略加介绍：胡鹏池乃江东人氏（江苏南通），1 9 6 2 年入清华就读机械系，1 9 6 8 年底毕业离开清华，职业生涯略有曲折终归平淡，谋于稻粱之际

仍笔耕不辍。但燊系楚人，1963年考入清华自动控制系，1968年毕业离校。两人清华文革皆参加414派，但燊在清华百日武斗后期还负责过防务，被同侪戏称“但司令”。其实但燊性格温文敦厚，和414绝大多数武斗留校的同学一样，绝非勇武好斗之辈，而是念及同窗好友尚被困于科学馆内，出于义愤和义气，无奈充当了414的廖化。胡氏在学生时代即喜舞文弄墨、且文采斐然。文革前有不少文史禀赋优异的学子，囿于时代潮流，报考了理工科的清华，鹏池先生当属此列。称其为清华727最称职的记述者，还基于以下四点：

1，亲历事件。两位都是66—68年清华文革的深度参与者，但燊还是清华武斗和727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。对727事件的真实场景和背景起因，当时就了解比较全面，认识亦颇有深度。因经历情感所系，多年来对727话题一直十分关注、并收集相关史料，也有比较深入的反思。笔者读各类文革史著述，非亲历者的文字，每令人有“隔”之感，着墨类隔山打牛，陈情似隔岸观火，议论更难免隔靴搔痒。而亲历者笔下如临其境的现场感，生动真实、令人信服的事件逻辑，读之让人不忍释卷。以清华文革为例，若干市井媒体后生，凭道听途说编造的清华文革故事，看几行就只能扔在一边。老托尔斯泰描述贵族生活栩栩如生、写到战争场面却顿失光彩，正是亲历和未曾亲历的巨大反差。即使是笔者素所尊崇的钱理群、秦晖先生亦不能例外，钱先生用自己发明的独裁、官僚、群众三种政治的理论框架，根据可疑的二手传闻，演绎出的清华文革故事，一看就知道作者文革并不在北京、更不在北大清华。秦晖先生从全国看清华、揭示广西724布告和清华727的内在联系，分析727的发生背景，对某些沉湎于从清华看全国、几十年后仍懵然无知的当事人，不啻有醍醐灌顶之效。但涉及清华文革和727的具体情节和场景，则每每“郢书燕说”，虽不失“论怀抱则旷而且真”，但离“语时事则指而可想”，已经相当遥远。当然，在727团派与宣传队的冲突中，414基本上是旁观者，对事件的回忆，虽不难做到冷静客观，但因为并未介入，对冲突双方的行动细节、特别是决策过程，缺乏第一手的了解，叙述中难免有缺失片面、不够准确、甚至失实之处。相信作者会诚恳欢迎当事人、特别是团派诸位头头，予以实事求是的匡正。更期望他们能本着对自己、对事件中贾祸的同学、对历史负责的精神，也写出亲历者全面真实的回忆。

2，政治正确。该词时下虽几近贬义，但笔者仍坚持认为，记述727这起重大政治事件、回顾人性得以充分暴露的大规模流血事件，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人文关怀，皆不可或缺。站在为作恶者袒护辩解的立场、或貌似超脱实则伪善的态度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，必然导致对史实的刻意隐瞒和歪曲解读。笔者所说的政治正确，既非革命喉舌的陈词滥调，更不是庙堂之上的站队看齐。而是雨果所言：“在至高无上的革命之上，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。”在反对武斗、不满文革人群的内心深处，政治正确并不是狭隘的派性纷争，而是人道主义的良知和情怀。满脑子人文自由、一肚子不合时宜、虽然也读过一些马列的书，但除了“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”之外，却依然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鹏池君，担纲此书的写手，当然是不二人选。相反笔者很难想象，如果由至今仍怀念当年“盛大节日”的文革活化石，由对莫须有的“思潮必胜”念兹在兹的“理论家”，由标榜最早反对文革、实则文革“冲锋队”的老红卫兵，或者让不知家国情怀为何物、但求听话出活的红色工程师们来写727，会持何种立场、会写出怎样的场景、又能给读者什么样的启发？

3，秉笔直书。笔者与两位作者是同时期的校友，在校时多有过从、亦颇知其为人。特别是鹏池先生，虽貌似儒雅，实性近子路。对灭绝人性的革命暴行、罔顾真相的政治谎言，一向深恶痛绝、不假辞色。其发微钩沉、还原历史真相的能力和效果，或有可商之处，然秉笔直书、力求忠于史实的态度和立场，则毋庸置疑。况言出有据、逻辑严谨，本乃理工学子叙事之优势。和大嘴文人的天马行空、信口开河，判若云泥。其人其文，与班固所称“其文直、其事核、不虚美、不隐恶”，庶几近之。

4，言而有文。叙述清华727的庞大场面和复杂人事，自然要有相当的文字功力，“言而无文、行之不远”如笔者等，绝难担当此任。鹏池先生长于写作、素有文采，在校时即稍有文名，近年更驰骋文坛，有《芦花瑟瑟》等文章作品面世，一不小心俨然跻身文坛作家之列。近年《清华园的一只蝴蝶》一文，依据有限但可靠的史料，以环环相扣、步步为营的缜密推理，还原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伊始，周恩来亲临清华搜集材料、为毛氏《炮打司令部》提供要害炮弹的史实。凡当年亲历者，相信读后皆不得不为之叹服。胡、但在本书写作中，仍沿用推理考证之笔法，且行文汪洋恣肆、娴熟老练，笔端热烈情感和冷静理性兼具，可谓文质皆胜、文质彬彬。

当然，对本书的观点和写法，笔者并非毫无保留。兹不避浅陋，略加点评，亦可借此就正于读者和作者。首先是本书体裁，作者名之曰“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”，这就让落伍如我，很有些费解。虽然文史不分家的传统“古已有之，于今为烈。”但具体到一篇文章、一本书，究竟属于历史还是文学，古今作者和学界皆有明确定位，并不含糊。本书倘冠名“历史文学”，按汉语语法修辞，即属虚构的文学范畴，不限史实、毋庸考证，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形同蛇足。但这本书的宗旨和写法，却明明又是春秋史笔，与书名大相径庭。在历史本该止步之处，却任文学的笔端徜徉，岂能以史笔存世？叙述历史却立意文学，行文之间，于史事或偏爱戏剧性情节，于人物则钟情脸谱化描述，难免和忠于史实的初衷相悖。文学的热烈情感，也会妨害在回顾历史时，做到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冷静客观。出于对文学情结的不舍，以及对此前作品中推理成功的方法自信，本书在史料搜集考证和情节演绎推理之间，略显失衡，有本末倒置之憾。推理固然要有相当的能力，也具备重要的价值，但再高超的推理，也抵不上一条可靠的原始史料。搜集史料固难，但有些并不难做到的当事人访谈，似乎功夫还下的不够。特别是以“知道会是什么结果”为理由，拒绝就有关情节向态度相左的当事人求证，诚为失策。其实无论今天当事人如何回答，都是可资参照考证的资料，哪怕是谎言，既不难揭穿，也足以刻画半个世纪后各色人等的态度，立此存照，又有何妨？此种武断或导致该书本可避免之硬伤。总之，在古老的历史和文学之间，硬要创新出一个性别可疑的体裁，难免因辞害义、招致误解。对所谓“逻辑性历史文学”的体裁，笔者委实不敢苟同。

其次是对727事件的基本背景、即清华两派之争，缺乏介绍，不知系无心忽略、还是刻意回避。这必然让局外之人、后世读者，对本书的理解发生困难。进入1967年的文革，各地各单位的群众组织，普遍形成刀枪相见、你死我活的两大派。其原因和规律值得专题研究。两派都高举文革大旗，崇拜红太阳、斗争走资派、砸烂旧世界。除了少数地区确有受权力当局操纵的“保皇派”外，大多只是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历史、对具体的人和事、对权力的分配争夺，存在分歧对立。清华的两派并无特别之处，声称两派分别代表正确和错误的观点和路线，实大谬不然。蒯大富麾下简称团派的井冈山兵团，无疑是典型的文革造反派，亦深得毛和中央文革支持，得到各地造反组织的拥戴。但一时风光无限的蒯大富们却因此头脑膨胀，不断为自己挖坑导致垮台，应了那句老掉牙的话：“上帝让你灭亡，首先让你疯狂。”而414不过是清华园里当时的反蒯联盟，思想和组织颇为驳杂，在反蒯的过程中，逐渐滋生了对文革和中央文革的不满，以至于按“对414也要区别对待”的最高指示，沦为需“区别对待”的另册。414反对中央文革，虽仅限于腹诽偶语，但多半拜蒯大富小报告所赐，文革当局对此早有成见，这并非今日之自矜，而是有728接见时的“御赐”：先是江青一吐为快：“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，也反对总理，康生，”毛也毫不掩饰：“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，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。”江青于是干脆明说：“四一四是反对我的。”看齐意识很强的谢富治不甘落后：“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。”而所谓“414思潮”，不过是414里的几个人，本着或许良好却失之片面和幼稚的模糊愿景，编造的一个清华梦，并未摆脱文革专制思想的镣铐和牢笼。既不能代表414大部分成员的真实思想，更不曾成就过够得上“思潮”的宏大气象。只是728经领袖加冕，令个别人从此自恋

自信，象莫泊桑《项链》中的女主人公，对此没齿难忘、堪为悲剧。与所谓4 1 4思潮不同，4 1 4在武斗前后的表现却可圈可点：武斗前坚决反对团派挑起武斗；武斗发生后强烈要求制止武斗；最后7 2 7全力支持宣传队平息武斗；书中对武斗问题、特别是7 2 7事件中两派的是非曲直，没有刻意回避，对各色人物的言行臧否，同样秉笔直书，这或许会被某些人指责为派性。但如果所谓派性，是以被文革当局宠爱有加还是被视为须“区别对待”的另类、是以挑起武斗不惜杀戮同窗还是坚决反对武斗、是以否定文革还是怀念文革来划分，那这样的派性指责，无异于是对该书政治正确的褒奖。也许有人又要说，4 1 4反对武斗，是因为在武斗中处于劣势、制止武斗对4 1 4有利。笔者作为亲历者必须澄清，4 1 4在武斗中的劣势其来有自，一是因为本来反对武斗始终处于守势；二是领导层头脑清醒，秉持对自己、对同窗负责的人道精神，禁止主动伤害和采取极端手段；三是4 1 4乃“在野党”，无武斗资源优势；四是外部特别是高层对蒯大富的支持。但无论如何，在7 2 7这一天，同一支手无寸铁的宣传队、事先并无任何倾向，队伍同时开至清华两派据点、同样要求“停止武斗、拆除工事、交出武器”，一派“无为无不为”，合作执行、毫发无伤。另一派则无所不为，断然拒绝、疯狂对抗，甚至开枪扔手榴弹致使多人死伤。让原本不持立场的数万宣传队员，顿时对清华两派有了鲜明的善恶或曰派性，毛、江对此也只有顿足骂道蒯大富真蠢。无论事先对清华两派有过怎样的成见，无论是当时还是在今天，恐怕没有任何人、能找到任何理由，说7 2 7事件中4 1 4有任何过错、团派又正确在哪里，能给出与本书相反、没有“派性”的记述和评价。

行文至此，笔者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：年龄相仿、教育环境相同、家庭背景虽形形色色但并无相关性，学习生活在同一校园内的学生，对文革、特别是对武斗的立场和行为，为什么居然如此泾渭分明？借用宣传队成员的话，“咋就差别这么大呢？”解释难免众说纷纭、见仁见智，或自以为是、或怨天尤人。笔者对此亦曾思索良久，一时不得要领。后读阿伦特似有所悟：文革中多数荒唐行径乃至罪恶暴行，皆属暴力革命大潮中“平庸的恶”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无论是俄罗斯十月革命、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，还是绵延千年的中国农民造反和内战，“平庸的恶”皆充斥其间。但另有一种恶，姑名之曰“权力的恶”或“台上的恶”，也值得关注和研究。在专制统治或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中，哪怕只是局部和暂时的权力，都会严重腐蚀执掌权柄的一方，令其犯下的罪与恶，远甚于尚未掌握太多权力的在野一方。并非是后者比前者有更高的道德情操，而是一切权力都具有自我维系和巩固的本能，不择手段，借助无从制约的专制权力或以革命的名义暴力作恶，是取得和巩固权力的首选和捷径。其最高形式，就是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杀戮，就是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。权力不但是腐败的土壤，也是暴行的温床，绝对的权力导致极端的暴力。当这种杀戮和迫害是以革命的名义、或高举崇高理想的旗帜，犯罪者则更加理直气壮和肆无忌惮，后果也更为恐怖和惨烈。蒯大富们信奉只要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，大兴和道县令人发指的文革惨案，皆为铁证。后者尚无更多作恶的权力和资源，只能主要以道义为号召，吸引理想主义者和社会精英，获得大众同情和支持。一个甲子的国共斗争史，逃亡之前的国民党尽显权力的恶，占领道义高地的中共，一度对普世价值的呼唤，亦自有其真诚和理想主义的成分。中共停止内战的呼声，和4 1 4对制止武斗的诉求，本质如出一辙。然而一旦形势反转，权力的恶又将重演轮回的悲剧。环球百年，慷慨激昂的革命者，倘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，最终变身作恶多端的独裁者，类似的故事一直在上演。台上的刘少奇，说党的决议就是法律，被赶下台后，却想起诉求法律保护自身人权。同一个蒯大富，从自己被王光美限制人身自由、到在“罗文李饶”法西斯专案组中迫害师长，相距不到一年！4 1 4在武斗和7 2 7事件中，之所以没有更多的作恶，无关道德、更不是思潮正确，而是4 1 4彼时和权力的恶，还基本无缘。同样7 2 7后在清华掌权的，如果不是迟群而是蒯大富，权力之恶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本书还有一点缺憾，或属笔者的求全责备。鲁迅批评中国传统史籍体例，多聚焦庙堂，不啻是帝王将相的家谱，诚切中要害。此弊来自家天下的政治体制，皇帝就是政权、政权就

是国家，不可以苛求于史家。写文革和清华7 2 7，倘能不完全落此窠臼，当可令人物光谱更为丰富、历史内容更加厚重。也就是说，蒯大富们固然是7 2 7当然的主角，大会堂里的各路神仙更关键重要，但此外还有许多情节和人物值得一书，不应吝于笔墨。首先是作为事件的另一方，宣传队各工厂的领队和普通工人军人，他们不应该仅仅出现在冲突现场和伤亡数字中，他们在7 2 7前后的所见所闻、所言所行，生动宝贵的史料值得发掘。伟大统帅口中的“炮灰”，即清华双方武斗人员、包括为团派助战的外地人员，他们参加武斗的原因和想法、他们在7 2 7的所作所为、他们后来的典型遭遇，似亦可单辟一章。“炮灰”们的家长、清华园的普通居民、清华周围和北京城里的市民对文革、武斗和7 2 7事件的看法，对于叙述和理解清华7 2 7，亦不可或缺。当然增补这些内容，显然超出两位作者目前的条件，不知可否期待未来的续篇或作者。

### 三

美国社会学家 Wrong 有言：“脱离了问题，答案没有意义。”笔者赞同此说，在本序最后，不避续貂之嫌、蛇足之讥，就7 2 7的若干问题略加探讨，既对一直为7 2 7当事人所困惑的问题，尝试作一些解答，也希望借此能帮助读者，对7 2 7、对文化革命有更清楚的认识。

本书读者多半会奇怪，在首善之区的北京、距中南海仅数公里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园，当局怎么会容忍武斗双方筑工事挖地道、拼长矛动枪炮、纵火杀人近百日，却不去制止无人过问？据《清华7 2 7》书中介绍，清华武斗初起，驻校海军宣传队、北京卫戍区、市革委，都曾出面制止但毫无效果。诡异之处在于，一天后所有来自官方的声音和行动皆戛然而止，放任清华武斗继续和升级。作者以为，这个“不怕乱、不管、不急、不压”方针的决策者，舍当时一言九鼎的毛外别无他人，而毛之所以有此貌似不合清理、不负责任的指令，或者有以下考量：

1，尽人皆知，在清华两派之争中，毛江夫妇毫不掩饰对蒯司令的支持。但6 7年底，毛和中央已经对全国的派别之争，确立了要求实现大联合、不支一派压一派战略方针，如果出手帮蒯压垮4 1 4，会制造一个错误导向的范例，不利全局。何况四面出击的蒯大富在上层树敌颇多，一边倒支持蒯同僚们也很难赞成。而且4 1 4人数众多也有一定影响，背后有没有上层势力暗中支持亦未可言，搞不好会造成三军无革派及其对立面那样的乱局。但蒯大富倘若能效武力打垮上柴联司的王洪文，通过武斗一举平定4 1 4，毛、江应该是乐见其成。对清华武斗不闻不问，无异于放手让蒯司令开打，但等清华捷报传至中南海。只是蒯司令和4 1 4的实力对比及武斗进程显然遭到误判，战端虽开却久拖不决，等不到捷报又影响全局只有出手制止。所以7 2 8接见时毛说：“4 1 4，几千人，你搞也搞不掉”、“要消灭4 1 4也不行”，遗憾失望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2，原来设想文革半年或一年收场，但两年过去，文革前期风云际会的北京高校，多数仍深陷派仗毫无头绪。当初天下大乱仰仗北京高校，如今由乱到治也必须先把高校搞定。但北京高校文革究竟如何收场，毛在四月也许还没有考虑好最后方案，或者上层之间还颇多歧见，暂时不闻不问，也是权宜之计。

3，政争中毛的敌情观念之强，无人能出其右，晚年尤甚。7 2 8接见毛说武斗还有一个好处是“要暴露坏人”，同时宣称怀疑4 1 4背后有黑手，又敲打蒯大富系被人操纵，不难窥见其放任武斗暴露坏人的心机。本想再演一出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戏，不料这一次蒯大富却把他当成了黑手。

在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中，抓点或曰蹲点，和搞运动、派工作组一样，是传统保留节目。首长或代表首长的夫人、下属到基层抓点，按官场潜规则，其他人一般不染指过问。自66年7月中旬起，清华文革已被毛格外关注，“春来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虫儿敢作声”的毛不开口，其他人只有、也乐得作壁上观。直至727，无论是老蒯纵火杀人、还是414请愿抬尸游行，如此严重破坏首都秩序、影响当局形象的行为，各级大员统统若无其事，再也无人过问。

那为何到了68年7月，毛又下决心出手制止清华武斗？这要“从全国看清华”。67年武汉720事件后，当局一改“文攻武卫”、“武装左派”、“抓军内一小撮”的号召，抛出“反军乱军”的替罪羊“王、关、戚”。平息武斗、弥合派争、稳定局势，成为调整后的文革战略大方向。但直到68年二季度，大乱的局面仍远未得到控制。彼时刘邓落马已成定局，“杨、余、傅”事件后党内派系暂得新的平衡，召开十二中全会、以全会的法定程序背书二年来的文革成果，为召开九大作准备，已经提上议事日程。制止武斗恢复秩序、特别是恢复京城秩序，已然是当务之急。在六月中下旬，高层应该对此曾专门研究并作出决断，毛在六月也就此多次放出口风。从“七·三布告”开始，一连串重拳出击凌厉果断。然清华枪声不止，何以号令天下？京城百姓及大小官员，对清华武斗早已啧有烦言，当局为此受到的非议和压力，从被414窃听的谢富治致蒯电话中，亦可见一斑。尤其是进入七月，清华战火愈演愈烈、濒于失控，毛终于再也不能坐视不管，出手制止清华武斗，已成弦上之箭。可惜蒯大富和他的总部委员们、以及麾下的谋士高参、动态组联络员，统统被革命、权力和宠信冲昏了头，居然对此浑然不觉。

理解了对清华武斗先放任后制止的前因后果，可能又有人要问：制止清华武斗途径本可有多重选择，既可以遣一哨官兵直接平定；也可以如六六年八月，派文革大员进校宣旨；还可以将728召见提前，事先陛前训示。以上方式皆可传檄而定，为什么却要派数万“宣传队”徒手开进清华园，采取这个貌似颇有创意却最终酿成冲突伤亡的方式？

这就要从派“宣传队”制止武斗的发明人说起，68年夏安徽芜湖武斗正炽，在安徽“支左”的驻军12军军长李德生，以强大武力为后盾，单刀赴会进入武斗据点、晓以大义震慑各方，遏制了武斗升级势头。后又于68年7月初，从合肥、蚌埠、淮南、马鞍山、铜陵五个地区，抽调大批军队和地方人员，组成强大的宣传队伍进入芜湖，不开枪、未流血，一举平定了全省最严重的芜湖武斗。毛对李德生此举大加赞赏，历来倡导“从群众中来”、又正在考虑如何平息清华武斗的他，必定深受启发乐得效仿。移植安徽经验，组织数万工人进校园“宣传”，师出有名、浩浩荡荡，在酷爱并擅长群众运动的毛心目中，此方案自属首选。同时身边警卫军的官兵，正在新华印刷厂等六厂“支左”，有直接策划指挥之便，芜湖经验的清华727版，由是应运而生。惜乎剧本虽好，但清华和芜湖的舞台环境和演员阵容，却迥然不同，清华727这场戏，还是演砸了。

明白了727为什么采取派“宣传队”的方式，接下来的疑问就是：多年来难得走到前台表演、也基本不介入文革具体事务的毛，为什么对清华727，要一反常态、亲力亲为呢？无论是毛自认“黑手”的讲话，还是自周以下一干要员，发生冲突后不敢做主、无所作为的态度，以及谢静宜等当事人的回忆，都充分表明：727事件唯一的策划人和总导演，非毛莫属。伟大统帅戎马一生，在地图边调兵遣将或属习惯和爱好，但深层次的原因，恐系以下二点：一是文革前后，毛对同僚及下属已经缺乏信任。从谋划文革时派江青南下沪上，到文革后期留毛远新在京当联络员，其对同僚的提防和猜忌日趋严重，基本上是“你办事，我不放心”。清华武斗事虽不大，影响却不小也十分敏感，委托何人颇费思量。727宣传队进清华，周或事先与闻其事，但显然并未参与策划，更不曾得到全权相机处置的授权，这从周破例夜半电话叫醒毛可以得到印证。六六年八月周秉承旨意在清华干的不错，为十一中

全会黜刘打开了突破口。然敌存灭祸、敌去召过，共同的对手已去，这次周还能不能忠实贯彻自己的路线方针，实难逆料。江青政治上固然可靠，但从她对清华两派和蒯大富的态度、以及7 2 7前后特别是7 2 8接见的表演推测，很可能她并不赞成7 2 7不偏不倚的做法，而且演员出身的她，平时处理政务不过因人成事，真要独当一面去搞定清华，多半搞砸。张、姚毕竟是书生，调兵遣将非其所长，而且北京不是他俩的地盘，既师出无名，更难以指挥。军委办事组那边本已尾大不掉，让他们介入不但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还可能将军队的派系纷争带入清华、乱上加乱。北京市谢富治这几个倒是唯命是从，但领会和贯彻战略意图的水平差距不小，而且蒯大富压根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搞定小小清华园，居然无人可以信赖委托，只有自己出面。由此亦可理解，文革中那个副帅即第二号走资派，为什么一直给其留有后路、充作战略后备。

另一原因，则是对形势的误判。本以为有禁卫军亲征并充当指挥和后盾，由北京市和卫戍区出面，数万工人出其不意大兵压境，几百人的武斗队必定望风披靡，兵不血刃即可凯旋而归。最多一直不听话的4 1 4制造点麻烦，正好趁机修理他们。自然无需另外指派火线总指挥，且卧榻安睡，但等明日胜利报告。然而事态发展却出乎意料，至少有八个没有想到，导致了对形势的误判和失算：1，没想到蒯会武装抵抗。听到蒯派开枪、宣传队多有死伤的电话时，毛的第一反应是“造反派，真的反了！”比愤怒更多的情绪显然是大感意外。可为佐证的是，据“宣传队”的工人事后说，工厂领导当日晨布置任务时，根本就没提到万一遭到抵抗该如何应对。说明布置7 2 7行动时，虽然毛也提到可能会流血，但从上到下，并没有为遭到抵抗发生冲突做任何认真准备。2，没想到本来打算搭个梯子，让骑虎难下的蒯司令下台，蒯却认定是“杨、余、付”黑后台操纵。既缺乏沟通，又想不到一块，梯子变成了陷阱。3，毛毫不掩饰“我才不高兴那个4 1 4”，却没想到对宣传队，“4 1 4反而欢迎，井冈山反而不欢迎”，“反而”的口气显然是意料之外。4 1 4在7 2 7无可指责、上下得分，清华今后的戏不大好唱，毛只有悻悻而言：“现在4 1 4高兴了，井冈山垮台了，我就不信”。4，没想到临时动员的几万工人，不可能象纪律严明的军人，做到“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”。有抵抗就有冲突，有冲突势必升级甚至流血，直到开枪死伤多人。宣传队必然群情激愤、撸起袖子准备打，局面完全可能失控。5，没想到清华的团派武斗据点内，除了本校学生，还有蒯司令的外省战友，其中不乏历经武斗沙场的凶悍之徒，他们多半不会在7 2 7置身事外。6，没想到北京清华和安徽芜湖的形势格局大不相同。没见过大世面的安徽造反派，哪能想到“杨、余、傅后台”那么复杂的背景，哪有胆量和驻军直接对抗？蒯大富却自恃毛、江是其后台，压根不把北京市放在眼里，当然更不把来路不明的“宣传队”当回事。在安徽制止武斗，有李军长亲临一线指挥决断，自然稳操胜券。北京这边虽高官如云，却没有责权高度集中的“李军长”。7，没想到清华7 2 7枪声一响，大小官员、各路人马谁也无从定夺，只有请示周大管家。精明如周，深知圣意难测，既然事先未被委托授权，何必冒风险去收拾局面？只有破例叫醒梦中人请示定夺。8，原来设想7 2 7行动自己只要幕后策划，在地图边向几名亲信面授机宜就万事大吉。没想到出师不利事情闹大，还必须亲自出面才能收场。经济学家奈特说过，企业家的价值在于把握不确定性，其实把握不确定性对政治人物而言更为重要。毛对7 2 7剧情发展的不确定性，缺乏预判却师心自用亲自导演，显然应负演出失败的主要责任。

毛之所以不让别人插手7 2 7，应当还有两个小算盘。一是如果委托他人去清华，担心对清华两派，他的态度和立场不能得到忠实体现和贯彻，此前派到清华的海军宣传队即为前车之鉴。毛、江从不掩饰他们对蒯大富的偏爱和支持、以及对4 1 4的反感和不得已。他们也清楚蒯在上层并不招人待见，7 2 8接见各方首长对蒯轮番批判围攻，为蒯说好话的也只有他俩。其中固然有外交部两个小耗子说的他们做脸、别人做屁股的情状，但对蒯等动情之处，却也并非全是做戏。毛不问情由，命令立即在大会堂前释放鲍长康、江对陈育延的特别关照、毛退了场又返回叮嘱不要整蒯大富，皆为明证。他们应该估计到，派别人去清华，蒯

多半没有好果子吃，而至少在727之前，毛对蒯仍然抱有不小的期望。另一个小算盘，则是要借机栽培昵称小谢的谢静宜。毛在晚年，“内举不避亲”、对亲属和身边人的着意提携，有目共睹。虽然后来张姓女子入常的名单真伪莫辨，但小谢可是从727开始，几年内从一名机要员，跃升至北京市委文教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、全国人大常委，据说差一点还当上了副委员长。无奈727前小谢既无从政经验和资历，又寸功未立，如何拔擢？无论是派长子入朝、还是叮嘱江青要“立新功”，以及文革初推荐《触谗说赵太后》，不难窥见打天下出身的领袖培养身边人的思路。派禁卫军出征清华，让奉旨出朝的小谢出头露面，参与平息清华武斗这桩貌似风险小、影响大的差事，机要员的升迁就有了铺垫。虽然迟群小谢最近在新华印刷厂作出了些成绩，但率领千军万马进清华，只有亲自担纲727总导演才方便点将，否则海里人才济济，哪里轮得上小谢？小谢这位通天的机要员，经727亮相，就此登上了政治舞台。但点将小谢显然不合常规，和小谢中间隔着好几级的上司、海里大总管汪东兴，不但没有在727现场抛头露面，而且728接见时众大员皆谈锋甚健，唯独汪一言不发，倘有所纠结和不满亦在情理之中。也许有人要指责此推测系诛心之论，但倘非如此，为什么小谢恰恰在727后，被完全不合常规地提拔？为什么在清华秉旨当差卖力气的是迟群，青云直上的却是传旨的小谢？到了丙辰年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又是“信是生男恶，反是生女好”，迟银铛入狱、谢却得免牢狱之灾。

727最大的谜团，也是蒯大富们的最大心结，就是他们忠心耿耿跟着伟大领袖闹文革，一向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偏爱，直到728接见伟大领袖对蒯大富仍然关爱有加，为什么727如此大规模行动，居然事先不让中央文革派人知会一声？特别是当天盲从蒯氏命令、打死打伤工人从而被追责、连累后半生的同学，对此尤难释怀、格外怨愤。五十年过去，不但蒯大富们对此耿耿于怀、百思不得其解，甚至一向严谨的史家如秦晖先生，还怀疑此乃毛氏阴谋、故意给老蒯挖坑。事出蹊跷，难怪秦先生的想象大胆，也再次证明面对复杂的历史事件，让非亲历者准确判断其中格局，实在勉为其难。

小谢等当事者的回忆说明，不打招呼既非疏忽、更非阴谋，而是事件策划时刻意为之的重要一环。认为出其不意可以防止包括黑手、派性在内的各种干扰，对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更为迅捷有利，所以层层布置时就要求保密，不让清华方面知道，“知道了不好办”。然而事实证明此举失当，是导致蒯大富们顽强抵抗的重要原因。所以面对嚎啕大哭、埋怨为什么不打招呼的蒯大富，毛也意识到不打招呼的失误，颇为尴尬，只好含糊其辞、用一句“招呼其实也是打了的”搪塞过去，接着又反诘蒯“414不也没打招呼？”为之辩解。也许毛历来信奉兵者诡道、“形兵之极，至于无形”；也许是他以为414反文革反江青、这次可能又对抗中央，正是因势利导予以解决的好机会；也不排除对清华和老蒯比较了解的幕僚，出了这么个“馊主意”，等着看老蒯跳进这个坑。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，还是毛、蒯之间缺乏了解和沟通，导致相互严重误判。紫禁城那边想的是，你清华在北京市，让北京市给你打招呼足够了，414还压根没招呼呢？文革今后要走上逐级指挥的轨道，中央不再直接发话，就从727开始。但没想到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纵容，蒯等骄兵悍将早已不把北京市放在眼里，北京市的招呼对蒯只是耳旁风。清华园这边蒯想的是，这两年走资派乌纱成打落地，一茬又一茬如同割韭菜，谁知道会不会又有大人物要被抛出来？宣传队要是你老人家派的，看在我忠心耿耿斗王揪刘的份上，怎么也该让江青派人知会我一声。蒯没想到他远未被当成远新、小谢那样的自家人，仍属于“王关戚”之流说烹就烹的走狗。紫禁城那边觉得蒯应该明白，在北京搞这么大的行动，我不点头谁敢？周不是说过在北京调一个排的兵也要经毛批准、谢富治不是说在北京开一万人的会也要中央点头吗？你蒯大富怎么会这点政治常识都没有？蒯却以为，文革兵荒马乱，一切皆有可能。“百万雄师”在武汉不是还把你老人家包围了吗？前不久你们不是还在说“杨、余、傅”有黑后台吗？这两年我们在北京不是动不动就搞数万人的行动吗？紫禁城那边想的是，最近中央接二连三出布告、发通令，你们应该领会中央制止武斗、要“收”的意图。蒯想的是，最近形势异常，是中央斗争激烈的表现，赌一



把和宣传队背后的黑手斗，保不齐和二年前反王光美一样，立功的机会又到了。紫禁城那边看清华武斗荒唐可笑不成气候，学生娃娃不至于“真的反了”、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动武。蒯大富却以为，宣传队徒手进校，又无首长露面，似乎没有多大来头，二年前来清华为我平反的，可是周恩来率领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。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，考验井冈山人的关键时刻到了，只有不怕牺牲，才能争取胜利。7 2 7 同台演出的两位主角，彼此误解误判如此之深，戏演下去将如何收场，不问可知。总导演气得连连骂道：“你真蠢”！真蠢的家伙除了埋怨为何不打招呼，也只有嚎啕大哭的份了。

对盟友和对手的误判，乃政治和军事博弈之大忌。袁氏称帝，系政治误判的典型。冷战期间，美苏为避免相互误判酿成严重后果，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务实安排。内战时期的中共，得益于卓越的情报工作，对国军动向每能准确判断、多有胜算。然夺取政权之后，在一系列重大政军博弈中，却屡屡误判，每每失算。朝鲜战争前对美国出兵误判；5 7 年整风和民主党派相互误判；培植盟友从地中海明灯到红色高棉一再误判；9 1 3 之前统帅和副统帅彼此误判；丙辰安排后事对各方势力真实立场的严重误判；后毛时代的己巳年，朝野皆误判酿成灾难；如何防止战略层面的严重误判，也许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所面临的重大挑战。然而7 2 7 的决策者对于误判及其后果，并没有半点反思和自责，7 2 8 接见时的相视而泣，并非为死伤者一掬同情之泪，而是为戏演砸了、事与愿违而难过。一切过错在愚蠢的蒯大富，没人敢说行动安排有失误。最擅长揣摩主公心态、并在其闯祸后为之开脱的，还数林副统帅，一句“损失最小最小”，就把7 2 7 严重失误之“鹿”，硬指为“成绩最大最大”的“马”，俨然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故伎重演。一干与会者随即附和，7 2 8 这一幕，也许是进城后凡遇重大失误的常态，怎能不令人掩卷长叹！

文人叙事，每以天气景色描绘为烘托。胡鹏池在他的新作《芦花瑟瑟》中，描写瑟瑟芦花，令情感的寄寓、气氛的渲染，更添文学感染力。《清华7 2 7》却疏于写景诚为缺憾。7 2 7 当天白昼炎热，下午从科学馆撤出的人群经东西干道东行时，蓬头垢面面色惨白，在阳光下格外刺眼。傍晚时分天公落泪、入夜一度疾风骤雨，令雨中进退两难的宣传队，处境更加狼狈不堪，上万工人又饥渴寒冷、迟迟得不到明确指令，不时枪声乍起、顿时一片慌乱。子夜开进校园的卫戍区军车上，刺刀在雨夜的灯光照射下闪着寒光……宣传队的领队之一，后来入主清华的迟群，对此情此景应难以忘怀，所以7 2 7 后在清华一次会议上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7 2 7 总是要下雨的”。迟群7 2 7 时乃8 3 4 1 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，他说总是要下雨的另一次7 2 7，应该是十五年前板门店停战签字，时值7月27日。不知道彼时已经入伍的他，是朝鲜战争的亲历者，还是在清华7 2 7 的雨夜中、听触景生情的战友，对十五年前7 2 7 的回忆。

板门店和清华园，相隔十五年的雨水，也许都象征着上苍熄灭战火的悲悯情怀。但点燃无谓战火、令无数生灵涂炭的罪行，并没有得到真诚反思和清算。为了狭隘的利益、虚妄的理想，以革命等形形色色貌似美好的名义，视愚民为草芥、驱使其争斗杀戮的悲剧，至今仍在这个地球上不断上演。本书作者以古稀之年，写就《清华7 2 7》，是期盼未来的人们，不再重演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悲剧、不再遭受我们曾经的苦难。

让7 2 7 的雨水，将邪恶的战火永远熄灭。

7 2 7 总是要下雨的，未来的7 2 7，还会下雨吗？

川文 丁酉暮春

~~~~~

【文献资料】

蒋帮头目和文人尊儒反法攻击批林批孔言论摘编
——批林批孔资料

现将一九七三年九月以来蒋帮头目及反动文人在台、港报刊上发表的尊儒反法、恶毒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摘编如下，供批判用。

◇ 狂热吹捧孔丘，竭力诋毁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

“批孔扬秦”不止是对民族文化的诬蔑毁坏，而是在酝酿并激起对大陆同胞生存生活“新文革”之巨变！它不止是对民族历史的撕毁和错乱，而更是对民族道德、民族命脉的悍然斩绝！”

——蒋介石一九七四年元旦文告。蒋帮《中央日报》，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

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它破坏中华文化，破坏中国人生活方式罪孽的总暴露！最近它又在搞批斗孔子推崇秦始皇的勾当，不但使“恶”蹂躏“善”，更是诬明德至善为恶为非，谓罪魁祸首为善为是，这就是要更加彻底的破坏中国人的伦理精神、历史法则和道德观念。

——蒋介石致伪国大年会的“书面训词”，蒋帮中央社台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……今天批判孔子，就是批判中国文化，就是清算中国人。

——蒋经国在伪国大年会上的发言。蒋帮《台湾新生活报》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中国文化以孔子之道为中心，毁孔子即所以毁中国文化。无如孔子阐扬人理，遵循人道，重视人格，顺率人性，适应人情，故其教成为人类共生共存之原理，为世界最进化之学说，有如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。厚植人心，屹立不动，千古常新。凡属中国人民，莫不崇敬。……其实孔子是最革命的，他反对暴虐，反对特权，反对聚敛，反对残杀，他所著《春秋》一书，主张尊王攘夷，……孔子是永久打不倒的，因为打倒人类生存的真理，也就打倒自己，无法生存了。

——陈立夫。蒋帮中央社台北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电

反孔，不只是反对孔子个人及其学说思想，乃是藉题发挥，企图由反孔挖根，从根本上消灭我国传统的优良文化与民族思想的整体。

——徐晴岚。蒋帮《中央日报》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、二十六日

我国文化以孔孟学说为中心，致广大而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不仅为我国学术思想的主流，使中华民族精神历五千年而不坠，对世界各国的影响，更是绵延不绝，历久弥彰。

……毛共企图站在“阶级斗争”的观念上，来污蔑孔子的思想；又用马、恩、列、斯所谓“不断革命”与“斗争到底”教条，企图消灭孔子所主张的仁义道德中心思想，实在自始就注定共党必败灭亡的命运。

……孔子的思想，代表我们坚固中华民族的精神，也融解在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中；孔子的人格光辉，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，愈是在民族危难、国家危急的时候，愈显出孔子思想影响的深远，自然形成一股莫可抵御的坚毅的安全力量，成为维护正义支持正义的抵柱。

——吴俊才。蒋帮中央社台北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电

孔子生在中国民族长期历史文化演进之中期，上面集前古之大成，下面开后代之新统。后人尊之曰至圣先师。至圣指其为中国民族理想人生之最高标准，先师指其为中国民族教育方针之最先启示。亦可说，中国民族长期历史文化，仍融摄凝合于孔子之一身，古往今来，中国人之共同理想，内心向往，乃于孔子一身而人格化了，孔子乃中国人具体的、同时亦是理想的代表。

——钱穆。蒋帮《中央日报》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孔子底贡献，是创立人文主义体系；并编订典籍；创始教育；注重为人、交友、待人、接物；倡导知识、道德、政治；发扬哲理、文学、艺术、史学；站在国家立场从事学术、教育、文化；创立儒学；形成士之一种人士，即今日的知识分子。这是何等多又何等大的贡献！……所以孔子是最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，可谓前无古人。

——任卓宣（即叶青）。蒋帮《青年战士报》，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

中国根本不曾有过奴隶社会。

……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奴隶制度，则孔子维护奴隶制度的话不打自倒。

——胡秋原。蒋帮《中华》杂志，一九七四年六月号

◇ 挥舞“克己复礼”破旗，鼓吹反革命“仁政”

我们与共匪，是自由与奴役的针锋相对，是人性和兽性的鲜明对比。……我们以亲民爱民的仁政，对共匪残民以逞的暴政，自可立于不败之地，稳操必胜之权。

——蒋介石“告台湾全体同胞书”。蒋帮《中央日报》，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

孔子……所谆谆阐述的“仁义”、“忠恕”、“中庸之道”、“克己复礼”一类的道理，则是没有时间性及地域性的。……其中“克己复礼”一句话，受他们的攻击特别频繁特别猛烈，这句话的意思，依照历代大儒之解释，乃是克服私欲，回复天理人情。这乃是在世上做人的正大道理。……却诬蔑孔子是要“复辟奴隶制度”。这真是胡说，使人非常气忿。

——董时进。蒋帮《中华》杂志，一九七四年六月号

至于孔子的学说如何，固然有许多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不同看法，但是他的中心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观点，是从来没有人怀疑的。而共匪把孔子说成是维护奴隶制度，确是千古奇闻，共匪既不能为它的说法找出证明，而仅以莫须有的栽诬方式，来诬蔑孔子，这是全世界的中国人都不能容忍的。

——方银城为蒋帮中央社撰写的特稿。蒋帮《台湾新生报》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一十二日

孔子在春秋乱世主张天下归仁，好施行仁政，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。

——黄耿卿。香港《星岛晚报》，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

把孔子思想形容为完全是“落后的，保守的”的说法，是采取一种恶毒的栽赃方式。孔子承认他是“好古”，……他主张“法先王”，是要人学习古代优良的传统，继承文化的遗产，并不是要人“食古不化”。他教导学生以古代圣哲作为学习的榜样。在当时礼仪崩溃的春秋时代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终年战患，民族疾苦的情况下，孔子主张“法先王”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。

——蒋帮《青年战士报》特稿，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起连载

◇ “咒骂秦始皇，攻击我‘批孔扬秦’是为了实行‘暴政’”

最近毛共“批孔扬秦”，乃一最愚蠢的作法。秦始皇的残暴，人人皆知，而毛共竟崇拜此一中国历史上的暴君，可知其内部斗争之激烈。

——蒋经国。蒋帮《联合报》，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

毛共这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，以孔子和秦始皇为代表，所以我们说这场斗争是秦始皇大战孔夫子。这当然不是学术思想上的争论，而是毛共内部政治局势的发展，它是文化大革命延续。

——丁中江。蒋帮《自立晚报》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自古暴政必亡，史有明证。始皇暴政，亦因中国人民反暴而速亡，毛共暴政甚于始皇，且违反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，必更速亡。

——“文化复兴委员会”的声明。蒋帮《青年战士报》，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

对于秦始皇，二千年来，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暴君代表，他狂想凌驾乎三皇五帝之上，自我作古，一统万世。开启了中国专制君主之端，用严刑峻法，去剥夺人民自由，钳制人民言论，恐惧知识，钩销历史，又复销毁兵器，焚书坑儒，总应当是子孙帝王，万世之业了。那知费尽心思，从钩戟长铍中夺来的大好河山，……短短二世而亡。所以文史家的笔下，常常赋予它一种特殊名称：不曰“暴君”，即曰“亡秦”，惟其“暴”，所以“亡”，暴得越凶，亡得越快，这一因果律，是古今中外不爽的。

——孔孟学会的声明。蒋帮《台湾新生报》，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

秦始皇之所以为千秋万代所痛恨，所唾骂者，实乃在于他焚书坑儒以毁灭中国文化……

——台湾北区一千四百余名大专院校教授的联合宣言。蒋帮《中央日报》，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

始皇焚书坑儒，更不是什么大地主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，而只是以暴行镇压民众的。他对于政治制度，有许多更改，其更改之为善为恶，且不必论，但是他用暴力的方法，实行恐怖主义的统治，那是绝对错误，连好事也变成坏事，遭遇到一般人民的反对。就其杀人一项而论，其名称之多与用刑之酷，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，真是惨无人道，天怒神怨，所以儒家和一切知识分子，都主张暴君讨伐论；对始皇暴行或心非而腹议，或声罪而致讨。所以焚书坑儒，乃是儒生以仁政反秦暴政，始皇镇压抗暴运动的斗争，简言之，乃是仁与暴的斗争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。

——蒋帮《青年战士报》社论，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

“焚书坑儒”是秦王朝的突出暴政，是导致秦王朝迅速复亡的主因之一，此一历史定论已一直绵延至今垂二千年。……硬说秦始皇代表先进阶级、代表新兴的革命力量更应属武断之词，是缺乏说服力的，特别是把那种惨无人道、背弃传统、毁灭文物典籍的“焚书坑儒”事件说成是“进步措施”，是“完全必要的”，是对历史“起到了积极作用”，谁又能信？！

——黎明华。蒋帮《中共研究》月刊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号

毛共以为秦代表法家，无儒而有法。但儒是文化，法是治术。且秦在当时并未主张法治。始皇实行君主专制，与法治根本不相容。

——“杂志协会”的宣言。蒋帮《台湾新生报》，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六日

……秦始皇的暴政是否法家的政术？秦始皇本身是否法家？

我答道：嬴秦用客卿以致富强，而助嬴秦致富的客卿大抵是三晋人士。而法家之学是三晋之学。这都是历史事实。但是我应该明白指出下列两点：第一、嬴秦暴政不自嬴政（即自称始皇帝者）开始。嬴秦暴政的根源不在于法家而是在嬴族的本身。第二，嬴政嗣位为王，又并六国而自称帝，他秉承嬴族暴政的传统，再加上他个人阴鸷的性格，推行暴力主义、恐怖政治于中原。法家的法制只是他的暴政的工具而不是他的暴政的根源。

.....

嬴政的暴力主义恐怖政治，是在法家的法制之上，加上下列成分，方才形成的：

其一是采取了邹衍“五德终始之运”的说法.....

其二是滥用燕齐方士.....

其三是利用严刑重罚.....

——陶希圣。蒋帮《中央》月刊第六卷第五期，一九七四年三月号

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要独占天下于百世万代，以行其暴虐独裁统治，如法家所谓“行僻自用”，也不是真法家。因为法家之“法”中有道，“术”中有圣，绝不会活埋读书人，火烧百家书.....。法家思想中根本没有“焚书坑儒”的主张，因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，是荀子的学生，“礼”外放而为法，也是一脉相承的。

——蒋帮《自立晚报》社论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◇ “否认儒法对立，胡说法家只是儒家的一个流派”

毛共要用秦始皇打倒孔子或孟子，便制造一出封建地主阶级打倒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说，由此硬指春秋以前的社会是奴隶社会，战国以后的社会是封建社会。孔子是奴隶社会的维护者，秦始皇是封建社会的倡导者。

——陶希圣。蒋帮《中央日报》，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

战国末年，思想虽然趋于统一，但六家变为三大派——儒家、墨家和法家，但亦趋于混合。

——胡秋原。蒋帮《中华》杂志，一九七四年六月号

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虽属于不同的流派，而法家思想也是从儒家思想中发展来的，这只是代表当时许多学说的并立情况，并不能说那一派思想是新，那一派思想是旧，而儒法二家的思想也根本没有共匪所形容的那样“尖锐对立”的情况。

.....

法家与儒家思想并未互相排斥，而是可以并存的。

——蒋帮《青年战士报》特稿，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起连载

在春秋战国时期来说，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都是属于实用主义的，法家是求近功，儒家是为长远的打算。

——蒋帮《青年战士报》，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起连载

“礼”外放而为“法”，礼即秩序。用于“克己”，是为“礼”的内则，用以“治世”，是为“礼”的外则。内则是修己工夫，外则是社会秩序、社会有变迁，故“外则”因革损益，人性要修持，故“内则”守常制衡。“礼治”与“法治”不是“一分为二”绝对的敌对斗争，而是演化的发展。

——侯立朝。蒋帮《新时代》杂志，一九七四年二月号

事实上，法家商鞅有“刑以去刑”之语，韩非子也曾说：“圣人之治民，度其本不从其欲，期于利民而已”（《心度篇》）；而孔子亦承认“刑”与“礼”的作用与功效，儒法之间的区别仅是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和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而已；其方法虽异，目标却基本相同，都是利民主义，不是残民主义。

——德学文。蒋帮《中央》月刊第六卷第五期，一九七四年三月号

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，儒墨两家有论争是事实，儒法两家有论争也是事实。问题是把儒法两家的论争说成是“阶级斗争”，“你死我活”的斗争、“儒法毫无传承关系”等横面切断主义，则是以杨荣国等人此次反孔的新谬论，这种把思想史的发展说成是“一刀两断”试的分开，这就没有“因革损益”，而是一个个的孤立长成从天掉下的思想了。……他这个论调到《红旗》刊出的《论尊儒反法》的作者手里，则演成更粗暴的“一刀两断”主义，……说什么“以前的学派为思想材料，这是流，不是源。”源流论也被他们颠倒了……

……原始儒家（孔、思、孟、荀）与法家（管仲、李悝、吴起、商鞅、韩非）的思想关系，绝对不是用“阶级观点”可以“一分为二”隔断其间的纽带的。……孔子之论管仲，推崇备致……子夏“居西河教授，为魏文侯师”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）。孔子以春秋属子夏，有传“礼”。法家的李悝、吴起为子夏门人，李悝变法于魏，吴起变法于楚，商鞅为“为之诸庶孽公子也，少好刑名之学”（《史记·商君书列传》），助秦孝公变法，皆子夏传“礼”启蒙的结果。韩非、李斯俱师事荀卿，荀卿又是原始儒家的殿军，这种关系如何能一刀两断？……儒一变而为法，是法亦儒也。

——侯立朝。蒋帮《新时代》杂志，一九七四年二月号

共匪把所有历史都套进“一分为二”的思想的模式中，显然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。众所周知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派，并不只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，尚有老子、庄子、墨子、杨子以及纵横阴阳等学派，后世归纳有十家，他们都有不同的学术立场，特别是战国时期纵横家几乎操纵了整个政局，如何能够说当时的历史都是“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”呢？

——蒋帮《青年战士报》特稿，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起连载

儒与法确是代表两条路线的斗争，儒、法都主张大一统（孔子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主张及周游列国求仕，就是大一统思想的表现），但道路不同。这是王道与霸道之争，极权与分权之争，自由与奴役之争。苏俄研究中国的学者也看到这一点。据匪报道苏俄学者说：“在早期儒家中，可以看到进步的方面：谴责巨富，人道主义，特别反映孟子言论中的某些民主性，以及建设改善人民福利，批评专制统治者。”“孔子和孟子都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的最高目的。”“法家思想中，包含一系列反动的概念：奖战、愚民、严刑、明察（监视人民生活）、反人道等。”这是对儒法两家相当客观的评价。

——周文青。蒋帮《中华日报》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

□ 摘自徐庆全：“八十年代”微信号

本期编辑：《华夏文摘》执行编辑：《CND》总编：
华新民（美国） 思语（美国） 陈天寒（美国）
《华夏文摘》网址：<http://www.cnd.org/>，国际刊号 ISSN 1021-8602
投稿专用地址：tougao@cnd.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：cnd-cm@cnd.org
